

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

海南岛乐东县番阳区 黎族群体变化的研究

张希祺
黄新美

著

海南大学出版

88.1

511

Z

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

海南岛乐东县番阳区 黎族群体变化的研究



张寿祺

著

黄新美

海南大学出版社

(内部学术交流)

目 录

序.....	(1)
前言.....	(4)
上篇 文化人类学之部	
一、番禺区的地理环境及其民族.....	(7)
二、番禺区黎族群体结构形成的探索.....	(11)
三、一九四七年以前各群体情况.....	(21)
四、番禺地区历史上农业生产演变考.....	(36)
五、一九四七年前番禺区杞群与俾群的群体关系 演变.....	(45)
六、近三、四十年来农业生产的巨大变化.....	(53)
七、近四十年来群体宗教意识的演变.....	(64)
八、新的农耕组合与优良风尚.....	(77)
九、文化人类学之部小结.....	(80)
下篇 体质人类学之部	
一、番禺区黎族体质特征的调查.....	(82)
二、番禺区苗族体质特征的调查.....	(96)
三、番禺区黎族的身高和体质指数的初步分析	(107)
四、黎族、苗族部份劳动力常见疾病的调查和初 步分析.....	(113)
五、体质人类学之部小结.....	(118)
后记.....	(119)

序

本文是中山大学张寿祺教授与黄新美副教授在1985年间两度来海南岛调查考察之后，所写出的海南岛黎族人类学论文。张教授四十年代曾在原私立海南大学任教，所研究的对象又是海南岛少数民族的内容。论文中对海南黎族群体近百年来，尤其是卅多年来民族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从群体结构、宗教、文化教育、农业生产以及群体体质变化的实际资料加以论证，充分说明黎族人民的原始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的也促进了农业生产逐步提高，思想意识不断冲破原始的宗教意识；其飞跃发展的时间过程以及群体体质变化的规律，均表明了民族的发展进步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休戚相关的真谛。

为此将之刊印，作为研究海南岛民族历史和少数民族民族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开端。

林 英

1986年11月8日

海南岛乐东县番阳区 黎族群体变化的研究

(内容提要)

全文是在长期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主要论述海南岛乐东县番阳区，黎族“杞”支群体和同一民族的另一个支系“俣”支群体的变化情形。

“杞”支的社会结构，长期残存着从原始社会末期所形成的，以血缘近亲几户人家结成一个一个被称为“合亩”的共耕组合，每个自然村均包括着几个“合亩”。这种组合，生产资料为整个合亩掌握，亩众共同劳动，生产上有严格的男女分工；收获物按亩内小家庭为单位，平均分配。

“俣”支的社会结构，则没有这种“合亩制”，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亦有男女分工，每户自种自收，与汉区小农经济相似。

这里“杞”支群体也好，“俣”支群体也好，在一九四八年以前，都笃信“鬼魂”，认为空间存在着天鬼、地鬼、雷鬼、火鬼、水鬼、祖先鬼各种各样的鬼魂，认为自然灾害、疾病形成，都是某种鬼魂在作祟，故一遇上灾难，便请巫师杀牛、杀猪祭鬼。

全区生产以农耕为业，主要是以刀耕火种的原始游耕方式进行生产。由于生产水平低下，一年收获物只能维持四个

月口粮，其余则靠挖野菜，或找寻野生的含有淀粉的块根以充饥。

一九四七年以后，社会开始发生变化，生产也逐渐地发生变化，人们思想缓慢地开始从原始宗教意识突破了一个缺口，到六十年代，农业生产才进到精耕细作的阶段。随着文化教育不断的普及，六十年代以后，人们思想上“鬼”的概念逐步动摇。

这里原是疟疾高发的发病区，六十年代后期，经过群众性的疏水沟，清除积水和败叶，堵塞产生蚊子的来源，疟疾病基本上得到扑灭，通过这些实践，人们开始知道过去所谓“病”由鬼作祟，乃是虚妄之谈；禾稼遭到虫害，亦懂得用农药，及时将之扑灭，从六十年代末期起，从原始宗教思想解脱出来相信科学的人，日益增多，生产上亦逐步变成讲究科学种田。一九四三年，若以山栏稻来计算，每年平均亩产约五、六十斤，水田亦不过一百四十多斤；到一九八三年，亩产双造达到一千四百八十九斤，家家有余粮。

人们的体质，经过我们用“体质人类学”方法进行测量和观察，发现这里的黎族人民，体质增长，一代比一代好，四十岁的一代比五十岁的一代好，三十岁的一代又比四十岁的一代更好，二十岁的一代体质又超过三十岁的一代。

本文并探索各个群体近三、四十年来，飞跃发展的过程及其变化规律；为民族地区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性的参考。

前 言

作者对本专题的研究，可溯自1952年秋。那时，梁钊韬教授受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托，组成小组到海南岛五指山区搜集黎、苗各族文物及进行历史调查研究，这时，张寿祺在海南岛工作，亦被委派参加此项工作。

这次进入五指山民族地区，先取道陵水县、乘小舟自陵水江而上，后徒步入群山，涉水过河，循悬崖小道直趋保亭。

当时，负责招待我们的，是保亭县人民政府卓秘书，他特别为我们介绍当地黎族人民社会情况，并提到保亭县通什、毛道一带，以及乐东番阳有一种“共耕组合”，早于1948年，这里的民主政府汉族干部，将这种组合译成汉字，称为“合亩”。当时梁钊韬先生认为这个译名带有民族学的学术意味，非常恰当。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注意到这种社会结构。（注）

在保亭停留了三天，由一些民族干部陪同我们出发，徒步往通什。那时通什处在河边，仅仅有几家船形茅屋，过了通什直趋毛道区；我们一路就这种社会结构向所能接触到的杞黎群众进行了解。并就地调查农业生产以及社会习俗情况。进入乐东县境番阳区，稍事停留，作了一些社会文化的调查，再徒步抵乐东县抱由镇。当时新成立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邑便在这里。

从乐东县抱由镇为起点，我们这个小组又分成两个小分

组，一个仍由小组长梁钊韬先生带领，继续前往东方县、白沙县进行工作；另一个小分组由张寿祺与海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韩巨丰同志合成，重返乐东番阳区、保亭毛道区工作，并核对来时调查所得的资料。在这两个区调查工作以后，又转到乐东县万冲区、三平区工作。

这一年在五指山地段，停留足足七十多天，这便是我们这个专题研究的起点。

一九五七、五八、五九三年，张寿祺因参加当时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重到番阳，并到东方县、琼中县等地区进行工作。其中在番阳停留时间较长，因之对番阳社会情况知之较多，当时张寿祺觉得番阳过去的社会结构，既曾保留着“合亩制”，又有非合亩制与之并存，各个群体的社会文化和人民体质，颇值得研究。一九五九年夏张因故离开海南岛，无法重来。

一九八三年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梁钊韬教授倡导，组织本系集体力量，对合亩制地区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及其体质变化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作为体质与文化相结合研究的初步尝试。张寿祺、黄新美积极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专题的研究任务，并定于该年秋后到海南岛进行工作，行前以研究经费无着，计划遂被搁置。

一九八三年冬，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在香港成立，张等遂将原计划送基金会申请资助，并获批准。一九八四年初夏，组成这个学术专题研究小组，接受梁钊韬教授所拟的上述学术思想为指导，自行制定调查提纲。八四年盛夏期间奔赴海南岛乐东县番阳区，进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两方面调查，归来以后，将这次调查所得，

结合梁钊韬、张寿祺两人早年调查纪录，特别是一九五二年张寿祺两进番阳调查所得的原始资料，加以对比分析，进一步弄清近三、四十年来这个区的各个群体社会文化以及体质两方面的变化情形。

另外值得一提的，这次，由黄新美主持，在番阳区布伦山“苗村”，测量了苗族人民体质，获得科学数据。

本书论述内容分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部份；从而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增进人民的体质有密切关系。这可能是本书的重要成果之一。希望能得到学术界以及民族地区实际工作者的指正，俾能为今后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性的参考。

注：见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一期）

上 篇 文化人类学之部

一、番阳区的地理环境及其民族

番阳区，位于海南岛乐东县东北角，东接琼中县毛阳区，与毛路、毛兴、毛贵等村相接壤；南邻保亭县毛道区，与空共、什守等村相邻；西界本县（乐东县）万冲区，北邻白沙县高峰区，西北接昌江县。

这个地区的四周，崇山峻岭盘桓，东北角与琼中、白沙两县交接之处有马或岭，海拔1546公尺，是这个地区的最高点，构成为乐东、白沙、琼中三个县的分水岭。北部“番阳林场”之西，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林场西”，其高度亦为1176公尺。其西北部边沿（即布伦山苗村的西北边），亦是高山大岭，其高度亦为796公尺。

处于东南边沿的侯感山，海拔为705公尺。西南面的山岭均在四百公尺以下。

整个地区为北部高，向南和西南部倾斜。

昌化江（俗名南介河）从东北角琼中县境，沿着山岭谷地进入本地区中央地带向西南直奔乐东县抱由镇，再转向西北、经东方县出海。

导源于保亭县的通什河（本地俗名南溪河）自南而来，通过保亭县毛道区，进入本区，在开示乡附近土名“合口”的地点与昌化江（南介河）汇合。

由于本地区地势高，又是处于多雨地带，山间的流水作

用，以及昌化江、通什河长期在这一带山区进行冲刷、侵蚀、搬运和堆积，遂构成了以开示乡为中心的一个小型平原，四周又有高山围拢，在地貌上便造成从宽阔的谷地向小型盆地过渡的类型。昌化江与通什河进入本地区之处，由于对山脉的长期切割作用，这两条河流的两岸，又造成长长的溪谷阶地。

这里，由于各个月降雨量不同，明显地将一年分为两个季节。12月、1月、2月、3月、4月上半月为干季；4月下半月以及5月、6月、7月直至11月，则为雨季。年平均雨量为1,600—1,700毫米。以5、6、7、8、9月这五个月份降雨量为最多。

温度。1月份平均温度为 18°C ，6月份平均温度为 26.7°C ，全年平均温度为 23.3°C ，整个区是个温凉适雨气候区。

这里黎族的村落，稀稀疏疏地散布于这个区的平原上边。并有一些村落，建立于本地区东部和南部昌化江和通什河所切割成的河谷台阶之上。

处于本地区西边的南益村则是苗村，西北部布伦山上的岗丘阶地亦有一条苗村。

这里出产以水稻、甘蔗、玉米为主，人们并种植冬瓜、南瓜和各种豆类以及凤梨、木菠萝、腰果、橡胶、胡椒、椰子等作物，并有大量的巨竹、野生的红藤、白藤等产品。

由于这里地处北纬 18° ，滨临南海，是热带地区，降水量较大，因之遍地长草，亦是一个天然牧场，故此黎族人民亦畜养一些牛群。

这个区的东北部，马或岭山地，披着一片原始森林，落

叶积聚而成的腐植质，达一公尺厚。

居于这里的民族，有黎族、苗族、汉族等民族。就海南岛黎族整个民族来看，其内部包含有几个支系。至于支系的分别和名称，历来学术界各有各的说法：一九三七年，德人史图博于柏林所出版的《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研究而作》一书，认为黎族有四个支系：（1）本地黎，（2）美孚黎，（3）岐，（4）俚。

一九五五年，中南民族学院诸先生认为可以分为三系、五大支：三系：（1）“俚黎、杞黎群，”（2）“本地黎、美孚黎群，”（3）“黎”群。五大支，即是俚、杞、美孚、本地、黎。俚支则包括俚黎、四星黎、三星黎。杞支包括杞黎、剃头黎、生铁黎、崖州黎。“美孚黎”“本地黎”则各自成为一大支；“黎”乃指“加茂黎”而言。（注一）

这样分法，使人难于理解之处：“俚”“杞”在分支上既有别，那又怎能将之列为同一“群”。“本地黎”“美孚黎”既然可以各自成为一大支，又怎能将之列为一群。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整个黎族，乃分为：（1）俚、（2）杞、（3）本地、（4）美孚、（5）加茂五个支系。（注二）

本书沿袭语言学界这样分法，对黎族内部是这样分别和称呼。居于番阳地段的黎族有两支：1、属于“杞”黎群体的（当地俗名“生铁黎”）。2、属于“俚”黎群体的又一支。据一九八三年的统计：这个区黎族人口为5862人，属于杞黎为最多，约占百分之六十五；俚黎的约占百分之三十

五。这两个支系共同在这个地区进行耕作，对开发这个地段都作出良好的贡献。

苗族人民历来居于山岭上，迁徙无常，一九五〇年以后，逐步定居于本地西边。

汉族，历史上多以货郎担身份来往于番阳、乐东抱由、保亭、白沙、琼东、崖城、陵水、万宁、那大之间，收购一些本地的土特产，贩卖汉区一些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在过去的本区历史上，这里曾有过几个以至十几个汉商小贩长住，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先后的返回家乡不再来。从一九四七年起，这里建立了“琼崖公学”以后，才有无数有志的汉族青年涌来学习，汉族人数有所增加。

这里昌化江与通什河的水力资源相当丰富，现仅有一小部份被利用；其余大部份有待开发和利用。

附：番阳区“群体”村落名称。

（一）属于杞（岐）群体的自然村：

毛或村，毛主（又名毛组）村、毛农村、三南村、布伦村、牙来村、牙万村、空什村、牙后村、孔套（又名孔首村）、三茂村、万板村、干打（又名才花村）、抱隆村、万透村、南打村。

共十六个自然村。

（二）属于倭群体的自然村：

开示村、洪吐村、加艾村、什艾村、保力村、坤步村、空识村。

共七个自然村。

（三）倭、杞为邻的自然村：

三共村。（仅仅是这么一个自然村。）

（四）属于苗族群体的自然村：

南益村。另外在布伦黎村之北布伦山上有一座苗村。

（五）汉族、人数不多，乃居于番禺的市集上。

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在精神建设上和物质建设上，建造出一个新的、美好的番禺区。

注一：详见1957年2月中南民族学院陈列馆编印的《海南苗族情况调查》（附：海南黎族苗族情况调查综合材料）189页至198页及其所附的黎族支系分布图。

注二：见欧阳觉正、郑贻青《黎语简志》85至86页。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二、番禺区黎族群体结构形成的探索

（一）

这个区的黎族，在一九四七年以前，存在着两种社会结构。一种盛行“合亩制”的社会，这便是“杞”支群体的社会结构。一种不具“合亩”的社会，而以自然村为单位，直接包含着若干户的社会结构；这便是属于“俚”支群体的社会结构。

所谓“合亩”，其原始形态乃是每个合亩，由若干户小家庭组成；这些小家庭均有着“血缘”关系。它的特点：

(1) 血缘关系乃是合亩组织的基础。合亩有大有小，最小的仅有2户，是由父、子户或兄弟户组成。也有由父子、兄弟、叔侄等户组成。亦有以亲属为基础，吸收外来逃荒到这里的贫苦农民合成的大型合亩。一般来说，每个合亩包括二至六户的为多。每个合亩都有一位“亩头”，大都以血缘关系中长辈充当。(2) 生产工具为各家所有；土地和耕牛，有些为全个合亩所有；亦有些已变为私家所有。山林，一般都属于一村或一姓所共有；生产资料，不管是私有的或公有的，都由合亩统一经营和使用。(3) 收获物由“亩头”主持，按户平均分配。

至于不具“合亩”的俸支群体社会组织，则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与汉区小农经济无大差别。

番禺黎族这两种社会结构，最初怎样形成？有必要加以追索；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地区近四十年来其群体变化的情况，有着积极意义。

(二)

居于番禺区“杞”和“俸”的两个支群，究竟谁先进入这里定居，是“杞”还是“俸”？

一九五二年秋，笔者在番禺进行民族文物搜集工作时（注一）、曾到抱隆村访问，该村七十岁杞黎老人王大滔，告诉我：在很久以前，整个番禺，只有牙万那里有人居住，其他地点，全没人居住，我们祖先是从搭搭乡（译音）迁来的。（注二）

一九五二年时，千打村（过去人们曾称之为“才花村”）曹东章、曹忠合、曹阿钵三位老人告诉过我，在很古

的时候，这里没有坡（指旱地），到处都是茅草。我们的祖先原是住在搭搭乡的。有一次，搭搭乡有两个青年打猎，追赶着一头鹿，追到这个地方来，就在河边把所追的鹿打死，并利用鹿肠作钓料，钓到很多鱼。当时这一带，只有“南打村”有人居住。这两个青年钓鱼时，和两个来河边挑水的南打女子一见钟情，而这两位女子的父亲，也很喜欢这两个青年，（南打附近没有村落，南打的女子难找配偶，男子亦讨不到爱人），但是，这两位女子不愿远离父母，因之结了婚以后，仍留在南打村居住。这两位青年遂回搭搭乡向村里兄弟说明番阳地方好，使搭搭乡的人跟从他们搬到番阳来，建成一座新的村落，名为“万透村”。

事隔三十二年，一九八四年六月下旬，我重来番阳进行调查访问时，布伦村六十岁的杞黎冯亚干又告诉我：“布伦杞黎先祖，是由东方县黎王洞那里搬来的。最初搬到万冲区一个地方，（其地点相当于今天万冲“先锋乡”），当时村里有一头母猪跑来番阳区布伦村生小猪，人们便跟从母猪到这里来。他们认为母猪生小猪的地方必然是块好地，于是便搬来这里安家。南打村也是从东方县搬迁过来的。在这以前，番阳一带是没有人居住的。”

这里，古老传说的本身，说法虽不一致，但从传说内容来看，可以看出一种迹象：杞黎支群的祖先搬进番阳地区来时，其他村落地点还没有人居住；这即是说：杞黎支群的祖先最先搬来番阳安家。

一九五二年秋天，我在番阳访问“杞群”的老人同时并访问当地“倭”支的老人。

洪吐村“倭”支老人罗阿农说：此地的“倭”，是他的

祖先哪一代从乐东县三平区头塘乡迁来的。

当时抱隆村“杞”支老人王大滔说：“俚”来到这里住，到今天不过是三代人。

以上材料表明，最早进入番阳居住的，是“杞”无疑。

“杞”支之所以进到番阳，就其传说进行分析，似乎与采集和渔猎经济有关。人们可能为着寻找更多的渔猎资源而来到这里。

北宋时期苏过《夜猎行》云：“海南多鹿豨，土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寝，则合围而周陆之，兽无犇者。余寓城南，户外即山林，夜闻猎声，旦有馈肉者，作《夜猎行》以纪之”。诗曰：“霜风肖肖陵寒柯，海月滢滢翻秋河，空山无人柴径熟，豨肥鹿饱眠长坡，山夷野僚喜射猎，腰下长铗森相摩……”（注三）

又：明人顾嶢《海槎余录》亦说“黎俗二月十日则出猎……猎时土舍峒首为主，聚会千余兵，携网百数番，带犬几百只……”

宋、明时期，黎族仍保存有大规模的围猎习惯；其远古时代，曾经有过一个以狩猎、采集为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阶段，更可想而知。

就近代而言，一九五二年，我在番阳、毛道一带工作时，所见到的不管是“杞”支或“俚”支，家家户户都备有狩猎用的弓箭，这些弓乃以竹片为身，以藤为弦，簇头是铁的，箭身是竹的。当时“杞”群，每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便进行频繁的集体狩猎活动；这种活动，有时以一个合亩为主，有时以几个合亩联合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此外，单独的个人，亦于4月至6月，农事活动告一段落以后，亦从事狩